

物。华。天。宝。

吴越国出土文物精粹

临安市文物馆 朱晓东 编著

文物出版社





物华天宝

吴越国出土文物精粹

临安市文物馆 朱晓东 编著

 文物出版社

摄影：孙之常 宋朝 郑旭明
封面设计：张希广
版式设计：葛晓霞
版式制作：张俊岭
责任印制：王少华
责任编辑：谷艳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华天宝：吴越国出土文物精粹 / 朱晓东编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010-3010-1

I. ①物… II. ①朱… III. 出土文物—华东地区—
吴越(893~978)—图录 IV. ①K8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2354号

物华天宝

——吴越国出土文物精粹

临安市文物馆 朱晓东 编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12

2010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3010-1

定价：240.00元

凡 例

1. 本书所收主要为晚唐及五代吴越国钱宽、水丘氏、吴随□、钱元瓘、马氏康陵等钱氏家族墓出土文物。文物分别收藏于临安市文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

2. 图版的编排分上下篇：上篇为“鉴赏篇”，精选有代表性的器物，按瓷器、玉器、金银器及铜器编排；下编为“资料篇”，以墓葬为出土单位，按排序号编排。

3. 临安市文物馆的藏品编号为排序号“1、2、3……”及相对应的出土号，浙江省博物馆的藏品编号为排序号“S1、S2、S3……”及相对应的出土单位号和藏品号，没有藏品号的保留出土单位号。

4. 形制相同的器物多集中介绍，图片上有两件或以上器物，排序的原则是从前往后，同一排中从左往右，其尺寸或重量完全相同的，对应的数据只给出一组，不同的则分别给出。

凡 例

1. 本书所收主要为晚唐及五代吴越国钱宽、水丘氏、吴随□、钱元瓘、马氏康陵等钱氏家族墓出土文物。文物分别收藏于临安市文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

2. 图版的编排分上下篇：上篇为“鉴赏篇”，精选有代表性的器物，按瓷器、玉器、金银器及铜器编排；下编为“资料篇”，以墓葬为出土单位，按排序号编排。

3. 临安市文物馆的藏品编号为排序号“1、2、3……”及相对应的出土号，浙江省博物馆的藏品编号为排序号“S1、S2、S3……”及相对应的出土单位号和藏品号，没有藏品号的保留出土单位号。

4. 形制相同的器物多集中介绍，图片上有两件或以上器物，排序的原则是从前往后，同一排中从左往右，其尺寸或重量完全相同的，对应的数据只给出一组，不同的则分别给出。

目录

●凡例

1-18

●概述

19-112

●鉴赏篇

113-181

●资料篇

182-185

●索引

186

●后记

概述



公元907年，随着辉煌一时的唐王朝的分崩离析，中国历史进入藩镇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

吴越国地处我国东南，建都杭州（时称西府或西都），全盛时期共领十三州一军，即杭州、越州、湖州、温州、台州、明州、处州、衢州、婺州、睦州、秀州、苏州、福州及安国衣锦军，范围相当于今浙江全境、江苏南部以及福建北部和上海的部分地区。由于吴越国历代统治者奉行“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和“善事中国”的治国方略，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贸易、兴佛重教，使得国家安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殷实，科技进步，文化昌盛，成为十国中的首善之治，史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¹⁾



图1 钱镠木刻像拓片

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五月钱镠受封为吴越王，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钱俶纳土归宋，吴越有国72年，历三世五王。

吴越国的开国者钱镠（图1），字具美，小名婆留，杭州临安人，父钱宽，母水丘氏。钱镠少年时以贩盐谋生，后投身行伍，屡有建树。唐咸通十三年（872年），21岁的钱镠弃农从戎，正式踏上军旅之路。唐乾符二年（875年）成为临安石镜镇镇将董昌的偏将，后任石镜镇衙内知兵马使，迁镇海军右副使，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军。唐中和二年（882年），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图谋浙西，钱镠率“八都兵”连战连捷，最终平定叛乱，被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卫大将军兼杭州刺史。其后联合杨行密击退南下的孙儒，景福二年（893年）升镇海军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年）威胜军节度使董昌僭越称帝，自立国号。钱镠奉诏出兵剿灭董昌，唐昭宗特赐铁券（图2）以示嘉奖。随后又击退救援的杨行密，占据浙东之地。乾宁五年（898年）钱镠将治所从润州迁至杭州，后又夺取婺州、温州和处州，平定徐、许之变，最终统一两浙，基本完成吴越国疆域的开拓。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为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年）封为吴越国王。

钱镠在位四十一年，对吴越国的建立和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当时藩镇割据的特殊情况，为求得生存实现其政治雄心，钱镠实行“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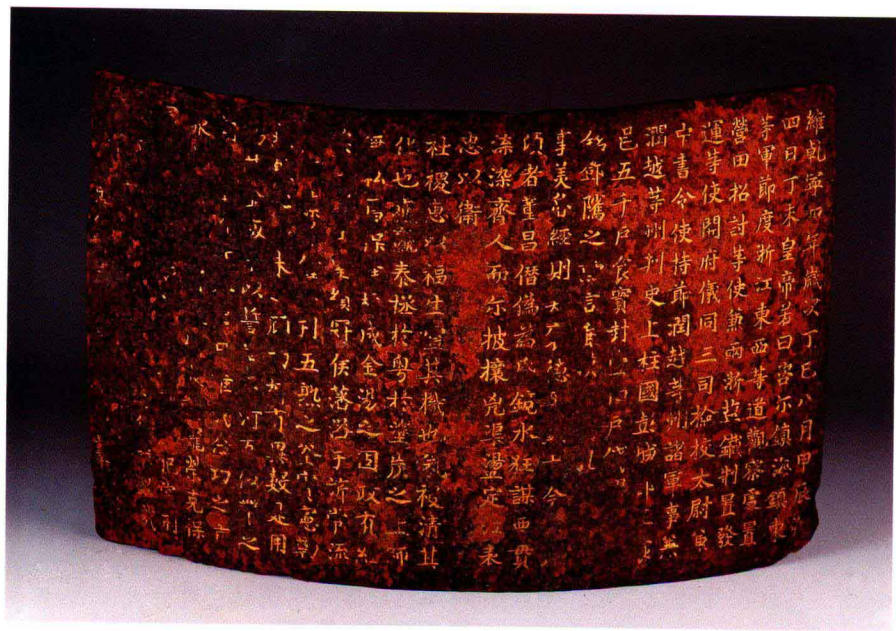


图2 金书铁券

境安民”的明智政策。一方面“知尊中国”，向地处中原的所谓“正统”朝廷纳贡称藩以示臣服，从而达到赢得支持、牵制强邻的作用；另一方面“不烦干戈”，尽量不主动开战，又网罗人才，加强控制，发展经济，保障国用，维持境内相对安定的局面。²⁾

钱镠之后，其继承者元瓘、弘佐、弘俶等继续实行这一基本国策。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四月，钱镠子传瓘嗣立，改名元瓘。应顺元年(934年)封为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四月封吴越国王。钱元瓘在位十年，仍遵照钱镠的遗训，继续执行“善事中国”的政策。吴越国在钱镠时曾有“天宝”(908-923年)、“宝大”(924-925年)、“宝正”(926-932年)等年号，元瓘继位后取消吴越国私行的年号，接受中原朝廷的加封，并尊中原朝廷后唐、后晋的年号为吴越国年号。天福六年(941年)九月，元瓘第六子弘佐立，十一月，封吴越国王。弘佐在位七年，除了尊奉后晋为正朔，当后晋为辽所灭，还曾改用辽的“会同”年号。经济上则积极实行富国强民的政策，轻徭薄赋，奖励垦殖。开运四年(947年)六月弘佐卒，元瓘第七子弘俶继位，同年十二月，内衙统军使胡进思等发动政变，废弘俶立弘俶，弘俶在位仅半年。

钱弘俶为元瓘第九子，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即位，乾祐二年(949年)三月封吴越国王。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称帝，国号“宋”，改元建隆。钱弘俶遵祖宗遗训，以名犯宋祖讳，去弘以俶单行，并遣使奉贺，宋授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钱俶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向北宋朝廷进献大量的奇珍异宝和方物特供，“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供大国，务得中朝心”³⁾。并携子亲自北上入朝，以表恭顺和忠心。又积极协助北宋灭后蜀、攻南唐，为北宋最终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钱俶上表纳土归宋，吴越国亡。宋改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后又为汉南国王、

南阳国王、许王、邓王。端拱元年（988年）八月，钱俶暴卒，年60，在位32年，宋追封秦国王，谥“忠懿”，葬河南洛阳贤相里陶公原。

二

吴越国虽割据一方，国力强盛，但多数时间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并没有称帝自立，吴越国王死后均敕以王礼葬，主要文献中均未记载吴越王的陵号。但1996年发掘的钱元瓘王后马氏墓墓志上称其为康陵，表明吴越国三世五王可能也有陵号。

吴越国王及王室成员墓主要位于浙江临安、杭州、绍兴和江苏苏州等地，有钱镠墓，钱镠父母钱宽、水丘氏墓，钱镠元妃戴氏墓，钱镠第七子、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瓘墓，钱元瓘王后马氏康陵及妃吴汉月墓，吴越国三世王钱弘佐墓，钱镠第六子（一曰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璩家族墓，钱镠第十九子钱元玩墓等。还有临安板桥吴随口墓，太庙山钱氏家族墓及杭州三台山五代墓等。

钱镠墓位于浙江临安太庙山（图3），未经发掘。钱镠卒于后唐长兴



图3 钱镠墓外景

三年（932年）三月，庙号太祖，谥“武肃”。整个墓地在宋时有“二顷四十五亩二角五十步”，范围包括整座太庙山和东西两沙及趋伸至衣锦街的完整区域。墓前原有华表、石兽、石翁仲等石刻，现存清代按原碑重立的一通墓碑，上刻“唐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谥武肃钱王之墓”。1997年在实施墓园环境整治工程时在神道左侧发现石质仗马、石翁仲和华表底座残件，2010年又在神道右侧发现石质华表（图4）、石翁仲残件，为我们考察和研究钱镠墓的选址特点、规模、格局及唐、五代帝王陵寝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 选址定制：为体现帝王生前至高无上的尊贵和权位，唐朝帝王陵寝制度区别于前朝制度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利用地形，因山而坟，五代王陵墓葬明显继承了唐代墓葬制度。钱镠墓的选址严格遵循这种礼制并融入了明显的堪舆特点。太庙山是临安市治中心唯一一座突兀隆起的小山，与钱镠故居钱坞垄和钱镠儿时常嬉的石镜山遥对。山势北陡南坡，东西两侧有余脉回抱，如天然门阙。山北有苕溪蜿蜒向东，山南有锦溪环流，是一处十分突出的风水形胜。

2. 规模格局：钱镠墓依王朝礼制筑墓茔、辟神道、置石象、植松柏、建庙立祠等，严格沿循了唐制。墓茔封土高度、形制和方圆范围合于帝王陵寝规制，神道顺山势向南展延，神道两侧分置石象生和华表，中轴设享堂、阙门等，墓陵四周和神道外侧密植松柏，依制建享堂五楹，供武肃王木主，以文穆王、忠献王、忠懿王、忠懿王配享，并于东府立庙奉钱镠真像入庙，致双祭等，体现了王陵应有的庄严和肃穆。

钱宽及水丘氏墓（临 M23、临 M24）位于临安市锦城街道西墅村明堂山（图5）。1978年11月，当地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钱宽墓，1980年又发现水丘氏墓。明堂山是一座小山丘，东西两侧有向南延伸的丘岭，山前为比较开阔的平地，形似一把交椅。两墓即位于山之阳、交椅的中间，东西排列，钱宽墓在西，水丘氏墓居东，相距6米，同茔异穴，两墓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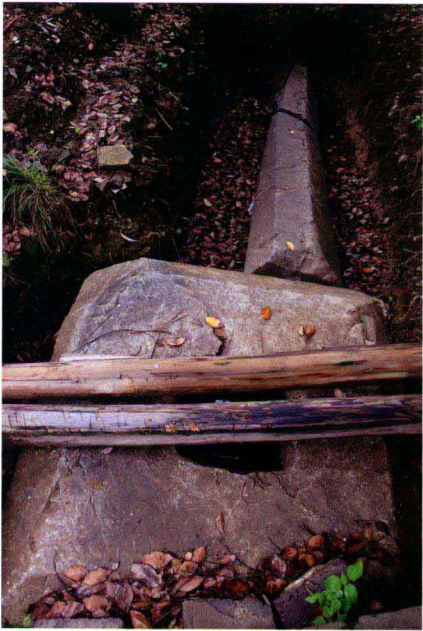


图4 钱镠墓前华表



图5 钱宽、水丘氏墓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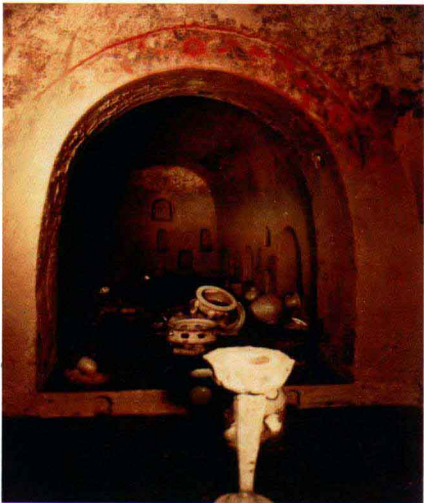


图6 水丘氏墓内景



图7 康陵外景

为船形砖砌券顶结构，分前、后室，并有耳室和壁龛（图6）。前室为长方形，后室略呈船形，前室前有短甬道和封门，前后室之间有短过道，后室内均绘有椭圆形天文星象图。钱宽墓全长6.78米，随葬有瓷器、银器、铜器、铁器、木器和石器等。⁴⁾水丘氏墓长8.4米，随葬瓷器、金银器、铜器、玉器、石器等100余件。⁵⁾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年），葬于光化三年（900年）；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年）。

武肃王元妃戴氏墓在临安西墅明堂山，位于钱宽夫妇墓前约10米处，1970年发掘，该墓几乎被盗掘一空，墓中仅存小罐1只。

钱元瓘墓（杭M27）位于杭州市城南玉皇山下，1965年发掘。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墓，墓前设墓道和弧形排水沟，墓分前、中、后三室，前室两侧带砖砌耳室。墓室四壁有彩绘及石刻浮雕牡丹、四神、十二生肖等，后室顶部有石刻天文星象图。由于早年被破坏，随葬品发现很少，主要为瓷器。⁶⁾据《吴越备史》卷二记载，钱元瓘卒于后晋天福六年（941年），葬于天福七年（942年）。

钱元瓘王后马氏康陵（临M25）位于临安市西南玲珑街道祥里村庵基山的东北坡（图7）。背靠庵基山，左为松树山，右有青支山，墓前空旷腹地原有小土丘（即案山），后被平为水田，前朝东山。墓在1996-1997年发掘，总长为11米，亦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石结构墓，分前、中、后三室，墓前设弧形排水沟。墓室内尚存石刻和彩绘，后室有石刻天文星象图，四壁有石刻浮雕和彩绘的牡丹图案及四神，十二壁龛内雕刻十二生肖人俑。前室和中室均绘有大型牡丹树和云纹、斗拱等，保存完好（图8）。墓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共计312件，有瓷器、玉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石器和木器等。根据出土的墓志记载，马氏葬于后晋天福四年十二月（940年）。⁷⁾



图8 康陵内景

钱元瓘妃、钱弘俶生母吴汉月墓（杭 M26）位于杭州城南施家山南坡，西距钱元瓘墓约 400 米，1958 年发掘。长方形砖石结构，分前、后室。墓葬虽早年被盗，随葬品很少，但墓内精美的石刻至今仍保存完好，代表了吴越文化的发展水平。⁸⁾ 吴汉月卒于后周广顺二年（952 年）。

钱弘佐墓位于杭州玉屏峰下，未经发掘。墓被严重破坏。墓南百多米处原有神道碑一座，为清乾隆年间杭州太守李公亨所立。史载其卒于后晋开运四年（947 年）六月，庙号成宗，谥“忠献”，葬杭州龙山之西南原。

钱元璩家族墓位于苏州西南七子山九龙坞西坡，1979 年发掘。墓室全长 14.34 米，为长方形砖砌券顶墓，分前、中、后三室，平面均作长方形，中室两侧各有一耳室。出土瓷器、陶俑、金银器、铜器、铁器、玉器及石器随葬品 100 余件。⁹⁾ 据《吴县志》记载，九龙坞为吴越王钱镠第六子（一曰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璩及其子中吴军节度使钱文奉的埋葬地，钱元璩墓居九龙坞正中。该墓在西，且规模较大、营建讲究，应与其家族有关，可能为钱文奉墓。钱元璩原名传璩，后晋天福七年（942 年）三月封广陵郡王，未及受命而卒，年 62，谥“宣义”。史载钱元璩、钱文奉“父子治苏（苏州）六十余年，祠墓皆在吴郡横山，一名荐福山”。荐福山即七子山。

钱元玩墓（临 M20）位于临安功臣寺后山，1958 年发掘。钱元玩曾在功臣寺出家为僧，法号普光大师。墓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分前、后室，其墓被盗掘，后室四壁可见石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十二生肖等。¹⁰⁾

吴随□墓（临 M21），1970 年 4 月，在临安板桥乡如龙村金家畈村西北后半山南坡开山造田时，发现一座五代吴越国墓葬，全长 6.16 米，

为船形砖砌券顶结构墓，分前、后室，前室平面为长方形，后室略呈船形。随葬品共发现 30 件，有瓷器、银器、铜器及石墓志等。¹¹⁾

太庙山钱氏家族墓（临 M22）位于钱镠墓东侧约 100 米处，1971 年 11 月发现，墓葬规模和结构与板桥吴随□墓基本相同，墓室已遭严重破坏，出土一批残木俑、瓷器及铜附件等。¹²⁾

三台山五代墓（杭 M32）位于杭州三台山东麓，1979 年 10 月发掘。全长 4.95 米，亦为船形砖砌券顶结构，分前、后室。该墓早年被盗，尚存随葬品 24 件，有瓷器、铜器、贝饰及石座等。¹³⁾

以墓葬形制而言，吴越国前期主要为船形砖砌结构，分前、后室，前室长方形，后室略呈船形，多耳室和壁龛；中期墓室平面一般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分前、后室或前、中、后室，前室左右保留耳室；后期墓室平面仍为长方形，砖砌结构，分前、中、后室，但耳室移至中室两侧。

吴越国王陵及王室成员墓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丧葬礼俗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墓中彩绘、石刻及大量精美文物的发现，客观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为研究吴越国的农业、手工业、商品贸易及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

吴越国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理条件优越。由于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社会安定。加上历代吴越国王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兴修水利，筑捍海塘抵御海潮的侵袭，疏浚湖塘，募民垦荒，修造圩田，奖励农桑，使得唐末以来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吴越国手工业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除了满足王室自身的奢侈需求外，由于历代吴越国王经常向中原朝廷进奉大量珍贵物品，间接刺激了制瓷、琢玉、金银器制造等方面的发展。

（一）秘色瓷的烧造

浙江是我国古代瓷器的发源地和重要产区之一，而五代吴越国时期则是浙江制瓷史上最繁荣时期。各地窑场林立，形成了越窑和瓯窑两大主要窑系。其中越窑系窑址主要集中在宁绍地区的曹娥江沿岸、慈溪上林湖和鄞州东钱湖一带。瓯窑系则主要分布于温州地区的楠溪江下游的东岸、罗溪、黄田和仁溪上游西部以及台州地区的温岭和临海等地。

吴越国时期瓷器烧造技术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秘色瓷”的大量烧造，代表了当时南方青瓷的最高水平。

关于秘色瓷的来历，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咏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可见秘色瓷是指唐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而宋人周辉《清波杂志》云：“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

将秘色瓷作为吴越国供奉给中原王朝越窑青瓷的专用词。南宋赵令時《侯鯖录》卷六载：“今之秘色者，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越器》诗……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进一步说明唐代越州地区已成功烧造出所谓的“秘色瓷”，至五代吴越时期被王室垄断。

长期以来对秘色瓷的认识一直纠结不清，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精心包裹的十三件越窑青瓷，与《衣物帐》称之为“瓷秘色”的记载相符，人们才知道所谓秘色瓷原来是指越窑青瓷中那些釉色纯正、制作规整的精品。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呈纯正的青色，装烧时一匣一件，器物外底留有若干支烧痕。¹⁴⁾

自1958年以来，随着吴越国王陵和王室成员墓的陆续发现，清理出大量制作精美的越窑青瓷器，使得人们对秘色瓷的认识越加深入。秘色瓷除了作为贡品被大量进贡给中原朝廷之外，也供吴越国王室自用。

钱宽墓共出土瓷器22件，主要为“官”、“新官”款白瓷器，只有3件越窑青瓷器，器形为盏、盆、壶。其中瓷盆口径30厘米，平折沿，深腹弧收，平底，灰胎略厚而细密，釉色青中微闪灰，润泽洁净，造型大方，堪为越窑佳品。另两件制作粗糙，釉色青黄易脱落。

水丘氏墓共出越窑青瓷器25件，有熏炉、油灯、盖罍、碗、罐、坛、油盆和粉盒等。釉色有青黄、青绿和青灰等，有的釉下绘褐色云纹。除了青瓷四系坛等少量瓷器外，大部分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其中青瓷褐彩云纹熏炉通高达66厘米，由盖、炉、座三部分组成。盖呈头盔形，纽作含苞欲放的荷花状（图9-1）。炉身直口，宽平折沿，筒腹平底。平底外缘承五虎首兽足，底座为环状须弥座形。熏炉通体施釉，器盖釉色青翠、滋润，炉身与底座因窑温不够等原因，釉色烧成效果欠佳。该器形体硕大，造型规整，工艺集镂空与釉下彩绘于一体，堪称晚唐越窑青瓷工艺的巅峰之作。青瓷褐彩云纹盖罍高66.5厘米，由器盖（图9-2）和器身两部分组成，通体施釉，釉色青黄、润泽，胎质细密。整器高大、规整、秀美，纹饰生动，体现了唐越窑窑匠如火纯青的技艺。青瓷褐彩云纹油灯为钵形，弧腹，高圈足外撇。通体施釉，呈青黄色，釉面滋润。釉下绘褐彩云纹，腹部饰六组双勾如意云纹和六朵绽放的莲花，腹底和圈足各饰八朵和十一朵云气纹（图10）。器内装满未燃尽的油脂。器形端庄，工艺精致，是晚唐越窑青瓷的精品。

吴随□墓出土越窑青瓷器15件，有碗、盒、盏托、罍、盆、钵、釜、罐、坛、器盖等，釉色青绿、青灰或青黄，大多制作精致，釉色匀净，有的还绘褐彩。如青瓷褐彩云纹罍高50.5厘米，颈与肩接连处置阔边复式一对。通体施青黄釉，色泽莹润。腹及颈下端均绘褐色卷云纹，肩上绘有覆莲纹。青瓷褐彩盖纽（图9-3），上半部为花苞状，下承荷叶边托，与水丘氏墓出土的青瓷褐彩云纹盖罍之盖纽极其相似。青瓷花口碗为五瓣花口，外壁压印五道内凹线。胎质坚致，釉色匀润，造型雅致。



图9-1 水丘氏墓出土青瓷褐彩熏炉盖纽



图9-2 水丘氏墓出土青瓷褐彩罍盖纽



图9-3 板桥吴随□墓出土青瓷褐彩盖纽



图 10 青瓷褐彩云纹油灯局部

三台山五代墓出土越窑青瓷器 19 件，有碗、洗、盒、盏托、壶和罐等，除盘口壶和罐较粗外，其余瓷器胎薄质细，釉色青绿，器形虽小但制作精细。如瓜棱壶器身作六瓣瓜棱形，长流弧曲，执柄高耸，釉色莹润，造型优美。

康陵出土越窑青瓷器 44 件，为迄今发现的吴越国王室墓中随葬越窑青瓷最多者，器形有碗、盘、盆、水盂、唾壶、盏托、套盒、粉盒、杯、杯托、壶、盖罐等，造型虽端庄朴素，但制作精美。胎体细腻致密，釉色大多青中略泛灰，仅个别青中泛黄，釉面匀净滋润有光泽，基本没有二次氧化现象。如青瓷唾壶为大盘口，小圆唇，束颈，丰肩，圆腹，矮圈足稍外撇。整器造型规整，胎体致密细腻。通体施釉，釉面匀净，釉色青翠滋润，为五代越窑青瓷中的上乘之作。青瓷杯托内外施满釉，釉色青灰，釉面润泽，胎质细腻、坚致，器物造型与晚唐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云龙杯托在工艺制作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元瓘墓出土越窑青瓷器 10 余件，有瓷罍、套盒、洗、碟、盖罐、壶和器盖等。制作规整，绝大部分釉色纯正。其中青瓷浮雕蟠龙罍高 30 厘米，器身圆肩珠腹，圈足外撇，肩部有四系。肩腹间浮雕双龙戏珠，四周绕以云纹。出土时龙身残附三小片涂金，说明龙身原来应用金饰，装饰华美，富丽堂皇。青瓷凤首器盖上半部为浮雕的凤首，凤首后部有一小孔可供系绳。下半部为管状榫，较长，既能作盖塞，又起固定凤首之用，造型生动，构思巧妙。

吴汉月墓出土越窑青瓷器 12 件，有盘、碟、壶、罐和器盖等。胎质精细，釉色以青绿为主，也有黄绿，釉层匀净，有的通体绘有云纹。执壶腹部饰直棱四道，瓜形，胎质致密，釉色滋润，造型别致。

钱元玩墓仅发现青瓷缸 1 件。缸为宽厚唇，口下有环耳 4 个，耳根饰柿蒂纹，上饰小圆饼 3 个，系仿铜器之铆钉。整器高 37 厘米，口径 62.5—64.7 厘米，底径 35—38 厘米。如此大器形的烧造成功非常困难，表

明吴越国瓷器的烧制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苏州七子山钱元璩家族墓出越窑青瓷12件，器形有碗、套盒、洗和盖罐。其中一件越窑青瓷碗口部钐金，通体施青釉，釉色滋润。

从出土物发现，唐代后期越窑已成功烧造出秘色瓷，如水丘墓发现的青瓷褐彩云纹熏炉的炉盖，那样的纯正青色应是晚唐秘色瓷中的佼佼者。但秘色瓷的真正发展是在吴越立国之后，此时器物种类更加丰富，绝大部分瓷器胎质细腻紧致，釉色匀净滋润，制作精细，造型美观。大型器的烧造更加成功，说明当时已掌握了很高的制瓷技术。至吴越国后期，秘色瓷的烧造水平可谓炉火纯青，尽管钱俶墓尚未发现，但从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碗、盘、套盒等越窑青瓷器可一窥当时秘色瓷的真面目，这些瓷器胎质致密细腻，釉色纯正莹润，饰有龙、鹤等纹饰，线条流畅，制作极其精致，代表了吴越国秘色瓷的最高水平。¹⁵⁾

为了秘色瓷的烧造，吴越国还在主要产地置官监烧。吴随□墓出土的双系坛内壁即刻有“官”款（图11）。明万历《上虞县志》载：“广教寺，县西南三十里，昔置官窑三十六所，有官院故址。宋开宝辛未，有僧筑庵山下，为陶人所祷。吴越领华州节度使钱惟治创建为寺，名保安。治平丙午改今额，俗仍呼窑寺前。”乾隆《余姚县志》卷九引万历旧志也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1977年，慈溪上林湖出土一件罐形墓志，腹部刻有“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殁于当保贡窑之北山”。¹⁶⁾唐光启三年（887年）钱镠尚为杭州刺史，越州属浙东观察使董昌管辖。说明至迟在晚唐吴越尚未立国之时，慈溪上林湖一带已设立贡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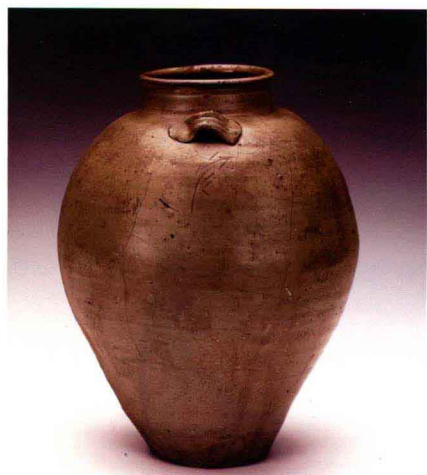


图11 “官”款青瓷双系坛



图12 白玉刻花带出土情形



图13 白玉刻花带面

（二）玉器制造业

目前吴越国时期玉器发现不多，主要见于水丘氏墓、康陵、钱元璩家族墓及雷峰塔遗址，以康陵出土最多。

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玉刻花带面平面呈半月形。一面刻三朵盛开的荷花，花两侧刻一对相向而立的鸳鸯。另一面刻三朵半开的荷花，两侧各刻一尾相向而游的鱼化龙。纹饰繁复，刻工精细。（图12、图13）

康陵共出土各类玉器70余件（组），有带面、纽扣、龙形雕、鸳鸯形雕及各类饰片。多以龙、凤、鸳鸯、蝴蝶、牡丹、灵芝等为造型，采用单面阴刻、双面阴刻、立体圆雕、镂空透雕等多种技法，风格写实，雕工精湛，质地光洁细腻，历千年仍莹洁光润如脂，非常难得。

白玉龙形雕平面呈三角形，双面雕刻，局部镂空。上部雕一条飞龙，下衬五组如意祥云。飞龙回首顾尾，通体阴刻网格纹。玉质纯正，构思巧妙，整体造型优美，雕刻形象生动传神。白玉牡丹花片形似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单面阴刻，由十片花瓣和一蒜形花蕊构成，花蕊阴刻网格纹，由三片花瓣合护，其余七片花瓣自然舒展，分三组两侧对称排列，中间一片扇形花瓣托底，花瓣上阴刻放射状线条，边缘为连续弧形。花朵中



图 14 雷峰塔遗址出土玉善财童子

下部镂两个对称圆孔。玉质莹润剔透，雕刻写实细腻，造型优雅别致，充分体现五代时期吴越国精湛的琢玉工艺。白玉灵芝花片采用镂空结合阴刻手法，双面雕刻，中间为两朵四叶重瓣花朵，花瓣中心各镂八个细长孔，增强视觉效果，外圈四朵灵芝，边沿呈连弧状排列，随沿单阴线勾勒，一侧为尖长尾部，中心镂椭圆形孔。花蕊、灵芝枝杆和尾部均阴刻线条。玉质白润，造型巧妙。白玉鸳鸯雕由躯体、一对翅膀和尾羽组合而成，躯体采用圆雕手法，体型丰满，由头、颈和身体构成，头顶有冠，头羽长而飘逸，双眼细长，颈部阴刻“米”字纹，躯体两侧和尾部刻凹槽，用于嵌插翅膀和尾。翅膀为扇形，镂细长条形孔，孔间饰阴线羽纹，翅羽边沿呈锯齿状，羽根处镂一小圆孔。这种立体组合形式的玉雕较为少见，是吴越国琢玉艺术的一大特色。

康陵出土的玉器主要为装饰所用，除了龙形雕、玉牌等可能用于悬佩的玉器外，有的如单面刻纹、穿孔的凤凰、鸳鸯等玉片可能是缝缀在某种织物上的饰件；而那些双面镂空雕刻的凤凰、灵芝、蝴蝶等玉片以及菱形、扇形、半圆形、瓜子形小玉片等，可与金银钗一起组合成类似安徽合肥西郊南唐墓出土的“金镶玉步摇”等冠饰。¹⁷⁾

钱元璩家族墓出土有玉佩、玉璜、玉坠等饰件，制作精致，特别是长达 28.1 厘米的鎏金玉饰件，器形别致，中间为木质包鎏金银皮把柱，上刻卷草纹，一端镶接五角形扁平玉饰，另一端镶接三角形和五角形玉饰，可能为玉节（万寿节）。这批玉器的质地经鉴定是当地产品。《吴郡志》曾记载钱元璩“令吴郡玉工颜规于王府便厅解玉”，说明五代时苏州琢玉工艺已相当发达。

除了吴越国王室墓外，雷峰塔遗址也发现观音像、善财童子、龟、“开元通宝”钱币等玉器，琢玉工艺与康陵略同。玉观音像用羊脂白玉制作，双面阴刻，质地细腻，观音头戴宝冠，身着天衣，端坐于如意云头上。玉童子像（图 14）以和田玉为料，采用线刻和浅浮雕结合的手法，童子作羽状眉、丹凤眼、大鼻小嘴，身着无领窄袖“米”字纹天衣，脚踏如意状祥云。底座饰有水波及山峦，寓意佛教“九山八海”。整器玲珑剔透，形象生动。¹⁸⁾

一般认为五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时间短暂并动荡的时期，玉器也与一定是处于衰败期。但康陵等吴越国王室墓葬及佛塔地宫发现的玉器，为我们重新审视五代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金银器及其他

金、银等金属器的使用在吴越国王室中十分普遍，金银被广泛用于进贡、日常生活用器及佛塔、佛像等装饰。

据《五代史》、《吴越备史》、《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记载，历代吴越国王都曾向中原王朝进贡大量金银贡品。如宝大元年（924 年），钱鏐进贡后唐方物中就有金银器，宝正三年（928 年）又进贡后唐白金